

# 高质量发展: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时代意涵与价值向度

凌磊 张振宇

**摘要**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职教高考制度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质的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职教高考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改革举措,其时代意涵与价值向度也理应遵循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属性和现实要求,积极破解职教高考制度执行标准离散与失焦、实施目标的迷离与失重、话语体系的弱势与失语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应构建“高质量发展”导向的职教高考实施标准,形成高质量发展的职教高考制度话语体系,构筑高质量的“政—产—教—社会”四域联合多利益主体合作机制。

**关键词** 职教高考;高质量发展;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34-0053-07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目标调整与方式转变,同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水平和前景产生深远影响。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以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sup>[1]</sup>。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是要在质的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sup>[2]</sup>。职教高考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改革举措,其时代意涵与价值向度也理应遵循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属性和现实要求。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普遍探讨职教高考的政策

逻辑、深层困境与实践路径<sup>[3]</sup>,也有学者强调职教高考的实践程序<sup>[4]</sup>、制度建设<sup>[5]</sup>和优化策略<sup>[6]</sup>,通过理论结合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职教高考制度构建过程中时代意涵和价值向度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研究以2022年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为指引,探索全面推进数字化、现代化的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发展。

## 一、理论逻辑:高质量发展是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时代内涵

里弗斯和贝德纳(Reeves & Bednar)质量概念的卓越质量观、过程质量观和用户满意质量观三个维度,与职教高考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其

### 作者简介

凌磊(1986—),男,宁波大学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考试招生制度(宁波,315211);张振宇(1996—),男,浙江大学科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考试与科举制度

###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省职教高考行动逻辑、系统调试与动态跟踪研究”(23NDJC126YB),主持人:凌磊

中,卓越质量观强调区别于其他产品的独特性质与特点,即职教高考区别于普通高考的质量要求;过程质量观强调实施进程中的规范与标准,即职教高考的实施过程与执行标准要符合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用户满意质量观强调产品使用者的满意程度,即参与职教高考的学生、老师、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评价结果。因此,职教高考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可分为独特性质量、适用性质量和利益相关者满意质量三个层面进行探讨。见图1。



图1 职教高考制度的理论构建

### (一) 独特性质量: 职教高考制度独有的目标属性

2022年修订施行的《职业教育法》提出了“职业教育”的内涵与本质。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sup>[7]</sup>。职教高考制度作为衔接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桥梁”,承担着为高等职业教育选拔具有培养潜质的储备人才的任务。职教高考“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双重考核途径,在选拔目的、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培养模式等方面与普通高考存在较大差别。例如,职教高考的选拔模式和考试方式与普通高考有明显差异,即普通高考强调文化课的考核,职教高考则重视对人才科学文化与职业技能的双重考查,这也具备了英国学者格林(Green D.)谈及的教育质量五层次理论中的第一层次独有的、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教育质量要求<sup>[8]</sup>。例如,2020年《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中指出的“实现职教分层、普职融通,为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实现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阶梯”<sup>[9]</sup>。

### (二) 适用性质量: 职教高考制度普适的过程属性

高质量发展的外显性指标通常是看社会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体现的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层次转化过程。职教高考制度的实施过程,是一个由无到有,由试点准备到全面推广的渐进模式。所谓适用性质量,是指职教高

考制度的实施过程、执行标准要符合职业教育人才选拔与培养的目的,符合国家高质量发展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动态变化要求。职业教育作为满足现代社会规模化技能需求的核心渠道,具有赋能技能型社会建设天然性的耦合逻辑<sup>[10]</sup>。职教高考制度作为衔接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纽带,兼具赋能技能型人才选拔质量标准建设、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提升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融通质量的作用。适用性质量还体现在职教高考制度中的技能考试需要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本科与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和满足技能考试相关条件的企业参与到职教高考制度设计当中。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发展中适用性质量的外延不局限于教育领域,还渗透在政府、产业等多个领域,能够将把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沿信息和技术更新动态通过技能考试的方式向政府、学生、职业院校等不同主体传播扩散,进一步明确技能型人才选拔与培养标准,逐步理顺技能型人才选拔质量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 (三) 利益相关者满意质量: 职教高考制度的结果属性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sup>[11]</sup>。学生日益增长的职业教育需求和职业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职教高考制度能否顺利推广的重要影响因素。职教高考制度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行动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能否得到充分满足,是评价职教高考制度的重要指标,是职教高考制度的结果属性。如果把办学主体定位成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利益相关者则是接受教育服务的顾客<sup>[12]</sup>。沙利斯(Sallis E.)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三个层级,包括初级、次级和三级。初级利益相关者是指直接接受教育服务的人,主要指学生;次级利益相关者是指给予初级利益相关者情感、经济等支持并且关系密切的人,主要指家长、管理者、雇主等;三级利益相关者是指与初级利益相关者并无直接关系,但初级利益相关者的改变会影响到其自身发展,主要指政府、未来雇主和社会等<sup>[13]</sup>。利益相关者对于职教高考制度的满意程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职教高考制度否满足了学生需求,是否满足了家长期待,是否得到了社会认可,是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导向。不同层次、不同诉求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使得职教高考制度质量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呈现出系统化和多样化的特点。职教高考制度质量的承载者始终是“人”,人的属性也造就了职教高考制度质量不同于物化产品质量的特殊性,职教高考高质量发展需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协作,它也必然会表现出目的

性、过程性和结果性等核心特征。

## 二、现实逻辑：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在职教高考制度领域亟需深入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各个环节、各个部分、各个主体在观点、立场、价值、目标、资源、结构、组织、机制、运行等方面的最优匹配<sup>[14]</sup>。职教高考制度同样如此，职教高考制度体系的每一部分、每一环节都应该切实分担制度体系的压力和重任，在各自合理定位和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职教高考制度科学支撑、效率至上、质量最优的发展态势。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选取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五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利益相关主体共计56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深入挖掘“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在职教高考领域扎根不实的表象与根源。参与访谈人员信息见表1。

表1 参与访谈人员信息及编码

序号	人员类别	人数	编码
1	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1	受访者1
2	职业院校管理人员	3	受访者2、受访者3、受访者4
3	招生办主任	5	受访者5~9
4	专任教师	12	受访者10~21
5	学生	30	受访者22~51
6	家长	5	受访者52~56

### （一）职教高考制度实施目标质量的迷离与失重

高考与职教高考作为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招生制度，直接影响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通常在设计和设置高考制度与职教高考制度的目标时，更多地考虑考试招生制度目标的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则容易被忽略。例如，习惯将职教高考制度的目标设置为招选拔和招收适合于高等教育阶段培养的预备劳动资源或劳动力。但对于职教高考制度在教育资源享有、社会阶层划分、职业属性划分、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避而不谈。如何打破社会民众对于职业教育的排斥与不信任，让家长愿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入职业院校学习，是职业教育乃至职教高考制度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难题。因此，在设计和设置职教高考制度的实施目标时，将深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实施目标以“读得懂、易执行、能实现、保公平”的形式予以呈现，是克服职教高考制度实施目标脱离现实、失去重点的重要举措。中部地区某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官员曾强调：提出一个相对科学、相对合理且能够执行的职教高考制度实施目标是当前职教

高考制度切实落地的第一道关卡。职教高考制度还处于试点阶段，大家都在摸索符合本省、本地区特点和实际情况的实施模式。我们在设计和设置职教高考的实施目标时，发现其目标主要集中在人才选拔这个单一维度上，而对于大国工匠的养成、社会资源的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考试和招生公平的维护等方面均未谈及（受访者1）。有学者指出，职教高考理应将公平性放在考试设计的首位，这是提高职教高考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的首要指标<sup>[15]</sup>。同样，设置职教高考制度实施目标时，理应将多结构、多指向、多维度、多元化的理念贯彻到具体实践中，避免出现职教高考制度实施目标的迷离与失重现象。

### （二）职教高考制度执行标准质量的离散与失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sup>[16]</sup>。类型特征不明显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困境，人们常常按照普通教育的标准审视职业教育，这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症结所在<sup>[17]</sup>。一方面，职业教育强调“普职融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强调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定类型”。这种矛盾在职教高考制度执行标准中也有体现。山东省与河南省在2022年开展了职教高考制度试点工作，河南省在职教高考制度执行标准与要求中提出，建立春季职教高考制度，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职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所占比重不能低于50%<sup>[18]</sup>。山东省的职教高考执行标准中提出，指导和支持山东应用型本科院校、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和专业更多招收中、高职院校毕业生<sup>[19]</sup>。从2022年起，山东省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不能再参加职教高考，职教高考报考人员为中职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sup>[20]</sup>。职教高考制度是践行“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创新理念的重要制度设计。不应把普通教育完全排除在外或者给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职教高考制度设置“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不能参加职教高考”的障碍，切实落实“普职融通”的教育发展模式 and 职业教育理念。笔者在访谈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时，他曾谈到：职教高考在具体招生过程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克服和解决。比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是否要排斥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职教高考？职教高考是否只是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设立？社会人员具体指的哪些群体并不明确（受访者7）。也有学生谈到，我是通过普通高考考入到XX职业技术学院的，高三上学期听说有职教高考，本想参加，但看到报名条件后发现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有点失落的同时也觉得不公平，职业高中的学生可



以参加普通高考,为什么普通高中的学生不能参加职教高考(受访者33)?职教高考制度需要探索出一条“兼容并包”又不失“职业教育特色”的创新之路,来抵御未来学龄人口减少、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 (三) 职教高考制度话语质量体系的弱势与失语

职教高考制度话语质量体系是指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过程中参与主体针对职教高考制度目标、理念和实施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想法等话语实践时,其话语体系的分量、地位、有效性、影响力。也就是说,职教高考制度向外界传递和表达的各类信息、理念、标准是否能够产生一定范围的影响力,是否能够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当前,职教高考制度话语体系仍然在技术导向还是理论导向、就业指向还是科研指向、工具主义取向还是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摇摆不定,这也反映出职教高考制度话语质量体系的“本质性弱势”和“边缘性失语”<sup>[21]</sup>。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职业教育一直以来不受大众的重视,部分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倘若进入职业院校意味着前途无望。这种意识上和理论上的困境导致职教高考推行速度缓慢,执行质量不高而导致的话语弱势是职教高考话语权的“本质性弱势”。此外,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差异也导致职教高考制度话语体系的边缘化处境。特别是在国际化、信息化以及数字化发展的国际格局下,“边缘性失语”意味着职教高考制度话语质量、话语影响力在下降。访谈时有高职院校教师谈到:长久以来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导致职业教育发展缓慢。职教高考制度开始实施后,我们期望看到的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有直接升入职教本科的升学途径;二是通过职教高考制度的执行,能够达到较高层次的人才选拔质量,为后续的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把好“入口关”(教师19)。职业院校学生家长表示:中考成绩发布后,得知孩子没有达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十分失望。辛辛苦苦供他读书,还是希望孩子能够争口气读大学,以后有个好的出路,孩子不能像我们一样在工厂打工。听说职业院校里面坏孩子很多,担心他走上歪路。听老师说未来他们可以通过职教高考进入大学学习,作为家长我不清楚这类大学和普通大学有没有差别?就业时会不会受到歧视?(受访者50)。从家长的担忧与疑虑中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社会大众对职教高考制度的不了解、不明确和不信任。这也是职教高考制度在执行标准设计、执行过程监督、执行内容推广方面需要重点考虑的环节,在确保高质量执行职教高考制度相关标准的同时,竭尽所能消除社会对职教高考的种种顾虑,重新构建职教高考制

度的有效话语体系,确保职教高考制度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地执行与推广。

## 三、再造逻辑:以高质量发展为价值向度科学构建职教高考制度

高质量发展是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价值向度。我国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发展价值理念的表达基于科学化、合法化、正当性的价值基础。如图2所示,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职教高考改革与调适:一是提升高质量发展理念在职教高考制度改革中的价值引领;二是构建高质量发展导向的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标准;三是形成“大国工匠”“质量为先”的职教高考话语体系;四是构筑高质量“政—产—教—社”四域联合的多利益主体合作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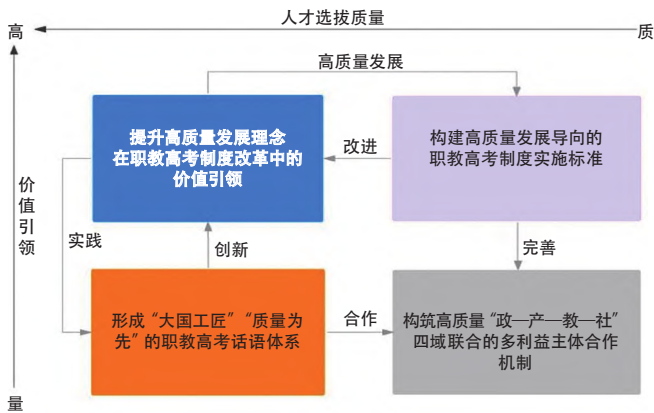


图2 以高质量发展为价值向度科学构建职教高考制度

### (一) 提升高质量发展理念在职教高考制度改革中的价值引领

运用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理念去认识职教高考制度,就是从社会发展以及作为个体属性的人的内在要求出发,运用社会规则和人的思维能力去认识、看待和评价职教高考制度带给学生、家庭、社会的影响,去构建未来理想的技能型社会。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创新的基础是专业技能,即每个职业通过发展其学术性知识和工作场所中的实践经验所积累和创造的技能<sup>[22]</sup>。高质量发展理念下的职教高考制度是实现职业教育领域专业技能培养的入口关。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还是社会发展都要基于相关职业群体在各个业务领域所创造和传承的专业技能<sup>[23]</sup>。这就意味着,提供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目标和理想信念,提供和引导人们建立适合的认识模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向社会输送技能型人才的入口,也是职教高考制度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我国当前的现实语境下,职业教育的

变革与创新始终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职业教育的考试招生、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理论探索最终都指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探讨中观层面的职教高考制度时,必须考虑到职教高考制度在我国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和社会体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与阶段性属性,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必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之上。此外,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是“理论先行”与“实践再造”的统一,它是政策制度保持先进性、可行性的“风向标”与“领航员”。质言之,无论是职教高考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是职教高考制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理念创新,都可以借助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理念加以诠释和解读。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目标从未脱离过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职教高考制度的价值导向也从未脱离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双向融合,它不断向前推进的持续动力是需要将散落于教育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的“职业认知与分类”转化为价值层面的精神内核,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探讨职教高考制度发展的价值引领。

## (二) 构建高质量发展导向的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标准和评价体系

职教高考改革主要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通过与教育部联合发文的方式来促进相关制度措施落地。例如,2020年教育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2021年与河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2020年与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提质创优的意见》等,开启了职教高考制度试点工作。上述文件也是职教高考制度实施与执行的标准。职教高考制度改革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目的是更好地沟通衔接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sup>[24]</sup>。因此,在设置职教高考制度的执行标准时,一方面要考虑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与特点,另一方面不能忽略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作用。政策的执行者需要将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实质和核心本质贯穿在“文化+技能”测试的实施、招生与录取工作的开展等各个环节之中。

科学、有效的政策制度的执行效果和实施成效都能够被评估、被评价。职教高考制度评价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评估与评价意见反馈,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因此,应构建职教高考

制度的PMC评价指标体系。政策评价(Policy Evaluation)旨在对政策制度的实施效果与影响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为了更加科学、准确地进行政策评价,政策评价计算过程(Policy Evaluation Monte Carlo,简称PMC)应运而生。PMC指数模型可以从多个维度对政策制度内容内部的一致性即政策适度的优劣程度进行判断和评价<sup>[25]</sup>。结合对职教高考制度相关政策文本关键词的挖掘和提取,职教高考制度的PMC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涵盖制度性质、制度内容、制度时效、制度可操作性、制度领域、制度主体、制度客体、制度视角以及激励措施九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要通过制度文本的分析得到。根据职教高考已颁布的政策制度文本,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PMC评价指标体系,以实现职教高考制度的横向、纵向等全方位、立体化的评价。见表2。

表2 职教高考制度的PMC评价指标体系表

编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职教高考制度性质	1-1构建 1-2引导 1-3支持 1-4实施
2	职教高考制度内容	2-1政策条件 2-2资源配置 2-3文化技能
3	职教高考制度时效	3-1短期 3-2中期 3-3长期
4	职教高考制度可操作性	4-1实施方案 4-2配套措施 4-3完成质量
5	职教高考制度领域	5-1政治 5-2 经济 5-3文化 5-4教育 5-5社会
6	职教高考制度主体	6-1教育部门 6-2地方政府 6-3财政部门
7	职教高考制度客体	7-1学生 7-2中等职业院校 7-3高等职业院校 7-4 教师 7-5家长 7-6社会大众
8	职教高考制度视角	8-1宏观 8-2中观 8-3微观
9	职教高考制度激励措施	9-1财政支持 9-2绩效奖励 9-3优待措施

## (三)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职教高考制度话语体系

职教高考制度顺利实施与推广的关键在于形成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我国职教高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部分原因是职业教育乃至职教高考制度的话语体系功能缺失以及长期依附于普通高考的结构性弱势。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职教高考话语体系能够帮助塑造健康、积极、无偏见的社会舆论氛围,引导相关参与主体正确看待职教高考的选才作用,重塑职教高考和职业教育在技能型人才选拔、“大国工匠”养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高质量发展的职教高考话语体系有其特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同于普通高考强调普适性与理论型人才的选拔模式,职教高考更加重视技能、技术等“实体性”的体系建设。职业教育领域需要重点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情况,回应人的全面发展和高质量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现实诉求,改变以往“学而优则仕”“重理论轻技能”的认知偏见,汲取有利于职教高考制度顺利推行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实质。此外,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发展的话语体系构建并不排斥“思

辨分析”的理论探索,作为职业技能型人才选拔关键环节的职教高考制度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双重属性,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此外,话语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进行的社会交往现象,文化性是其根本属性<sup>[26]</sup>。我国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同时不断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强化了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科学选才、公平选才的选拔功能,克服职业教育长期以来饱受招生难困扰,进一步凸显了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自主性和民族性。

#### (四) 构筑高质量的“政—产—教—社会”四域联合多利益主体合作机制

职教高考制度是突破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制度壁垒的动力机制<sup>[27]</sup>。职教高考制度不仅是职业教育内部的改革举措,而是需要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都参与和支持的系统性变革。也即是说,需要从政治领域、产业经济领域、教育领域、社会领域携手推进职教高考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之所以难以改革、举步维艰,追其根源主要是背负了太多社会责任<sup>[28]</sup>。优质教育资源也属于社会资源,它的分配与再分配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任何涉及考试招生领域的变革稍有不慎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就要求背

负双重压力的考试招生制度每走一步都需备加慎重<sup>[29]</sup>。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职教高考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职业院校选拔适合职业技能型培养的人才。但将其放置于社会学领域,又会衍生出社会分层、资源分配、阶层固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之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传统,进一步加剧了职业教育选才的难度。从产业领域的视角来看,产业界需要大量具备相应职业技能的劳动力,而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进一步引发了“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毕业生找不到就业岗位”的双重尴尬局面,因此,需要职业教育领域与产业领域密切沟通与协作,产业界将自己的现实需求第一时间反馈给职业教育界。同时,在职教高考制度强调“文化素质+技能考试”的背景下,产业界的公司、企业、工厂能够向职教高考开放相应的场地用于技能考试,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职教高考制度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组织技能考试的困境。作为代表政治领域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统筹职教高考制度与政策的基础上,应发挥自身协调产业、教育、社会等领域的沟通职责,建立高质量的“政—产—教—社”四域联合多利益主体合作机制,让更多的人民群众相信职业教育,让职教高考制度在新时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振兴之路。

#### 参考文献

- [1][2][11]“十四五”规划《纲要》名词解释之3|高质量发展[EB/OL].(2021-12-24)[2025-09-31].[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gzh/202112/t20211224\\_1309252.html?state=123&state=123&state=123](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gzh/202112/t20211224_1309252.html?state=123&state=123&state=123).
- [3]李鹏,石伟平.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政策逻辑、深层困境与实践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0(6):98-103.
- [4]杨磊,朱德全.职业教育高考实施程序:现实表征、实践难点与优化对策——基于C省的实践证据[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6-147.
- [5]陈虹羽,曾绍伟.类型教育视角下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的逻辑要求、难点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21(10):13-20.
- [6]凌磊.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面临问题与优化策略[J].大学教育科学,2023(4):119-127.
- [7]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2022-05-01)[2025-09-31].[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
- [8]GREEN D.What is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M].Buckingham: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20.
- [9][19]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EB/OL].(2020-01-15)[2025-09-01][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0/1/15/art\\_107851\\_82457.html](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0/1/15/art_107851_82457.html).
- [10]刘晓,李甘菊.面向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转型:体系重塑与治理策略[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1):158-163.
- [12]李勇江,李志义.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的关系[J].教育科学,2023(4):90-96.
- [13]SALLIES 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in education[M].3rd.ed.London: Kogan Page Ltd.2002: 22.
- [14]刘振天,李森,张铭凯,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考与分类推进[J].大学教育科学,2021(6):4-19.
- [15]李政.职教高考改革的利益博弈与政策调试——基于利益相关主体的扎根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3(19):77-84.



- [1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 [2025-09-04][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17]申素平.优化职业类型定位,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法》实施[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2023(3): 22-31.
- [18][20]李淑娟.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的区域实践——以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 2023(6): 20-25.
- [21]李文.话语权力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J].江苏高教, 2019(5): 16-21.
- [22][23]刘思达.新发展格局下的当代中国职业研究——从劳动分工到专业技能[J].中国社会科学, 2023(4): 63-82+85.
- [24]张仁杰.分层与整合: 职教高考政策的评估与反思[J].中国高教研究, 2023(4): 48-54.
- [25]李天峰, 伍海泉, 陈荣赓.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地方政策研究: 基于“路径—工具—评价”框架的量化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 2023(12): 7-15.
- [26]赵蒙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话语体系: 内涵、价值与构架进路[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1): 80-87.
- [27]王笙年, 徐国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度壁垒及其结构性消解[J].高校教育管理, 2023(1): 92-99.
- [28]郑若玲.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1-10.
- [29]凌磊.韩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研究[D].厦门: 厦门大学, 2020.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Ling Lei, Zhang Zhenyu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dheres to the theme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to achieve effective growth in quantity through quality improvement. As an important reform measure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uld also follow the basic attribute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he scattered and unfocused execution standar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the confusion and weightlessness of implementation goals, and the weakness and aphasia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Therefore, It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value guidance of the reform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truct the implementation standar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uided b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m a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high-quality “government-industry-education-socie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uthor** Ling L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Education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Zhang Zhenyu, PhD candidate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Studi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